



□ 乌裕尔

很多年以前，在自己主持的报纸上以“乌裕尔”的笔名发过几篇小文，一天在一位领导的办公室，领导问我，“乌裕尔”是谁啊？我回答，就是在下。领导看了我一眼，又问，怎么用了这么一个名字？我笑笑，简单做了几句解释。

前段日子用这个名字又发了一篇小文《看火车站》，又有朋友问起这个问题，引发我的思绪从还没有建成的火车站出发，从首都北京回到生我养我的故乡，回到一条河的身旁，而这条河的名字就叫“乌裕尔”。

其实，用家乡的河的名字作笔名的，最有名的当属大文豪郭沫若。郭沫若原名郭开贞，“沫”和“若”分别是他的家乡两条河的古名。那么沫水是今天哪条河的名字呢？就是大名鼎鼎的大渡河，而若水则是雅砻江，它们分别是岷江和金沙江的支流。

这样说丝毫没有和郭沫若类比的意思，而我的乌裕尔河自然也没法和 大渡河、雅砻江相比，但我知道她、认识她、理解她，肯定要比大渡河、雅砻江早得多，甚至要比黄河、长江早得多，因为我一睁开眼睛，几乎在看到母亲的同时，就看到了她。她就是我的母亲河。当然，这个判断是在我离开她的时候涌上心头的，而在离开之前，她更像我儿时的伙伴儿，熟悉、亲密，熟悉到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，亲密到不知道她来自何处，又去向何方。

所以，在离开的那一刻，当火车在她的身上穿梭而过的瞬间，突然觉得，安安静静 的她，一下子变得陌生、神秘。请你原谅，我日夜相伴的母亲河，我真的不了解你啊！

离得越远，心反而会走得越近，也就会看得更清楚，认识得更深刻。

关于乌裕尔河的名字，有一个美丽的传说，但故事长而老套，总之就是神话加爱情。而史料则来得更直接。金代在乌裕尔河流域设置蒲峪

路，称“蒲峪路河”。元代称“忽兰叶河”。《大清一统志》称“呼雨哩”“呼裕尔河”，又称“乌雨尔”“瑚裕尔”“乌羽尔”河等，均为女真语一音之转，什么意思呢？“涝洼地”而已，实在缺乏点想象的意境。新中国成立后在有关资料和图籍中并用乌裕尔河和呼裕尔河。

在这条河的介绍中，有一点我特别注意到，她被称为“无尾河”，所谓无尾河，就是没有河口，再直白一点说，就是流着流着就没了。被称为中华民族“母亲河”的黄河，由于其下游历史上经常改道，成为世界上著名的摆尾河。那么这条仅有黄河十分之一长的河流竟然有头无尾，那最后消失在哪里呢？

她消失的地方是一片苇甸，或者说是广阔沼泽，用再富有一点想象力的文字表达，也称美丽的湿地。可能更应该反过来说，因为她的消失，才形成了被称为地球之肾的一望无际的湿地，才有了世界著名的丹顶鹤的栖息地——扎龙自然保护区。

但是，我对她更深的感受还是，她是一条自东向西流的河，也就是说，是一条逆流的河。小学地理知识告诉我们，我国地势总体上西高东低，百川向东归大海既是一种无须多言的自然规律，也是一种令人激情澎湃的境界。一条小河竟然不顾大势，逆向而流，最后无声无息地消失，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选择？

事实上，在众多江河争先恐后奔向大海的同时，不只是乌裕尔河一条河选择了逆流。我查找了一下，比较有名的有这么几条，比如，位于新疆北部的额尔齐斯河，发源于东部的阿尔泰山，自东向西流动，汇入鄂毕河，流经西伯利亚地区，最终注入北冰洋。

比如，位于甘肃陕西北部河西走廊的疏勒河，是我国一条内流河，发源于祁连山脉西段的托来南山与疏勒南山之间，总体流向为自东南向西北流动，流程大约为580千米，这条河在史前曾经

注入位于新疆的罗布泊，后来由于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，流程大大缩短，现在退缩到大致安西西湖一带。

比如，位于新疆西部的伊犁河，因为地势北东南三面高，向西开口，因而伊犁河也是自东向西流动，最终注入位于中亚的巴尔喀什湖。

在网上“我国有哪些自东向西流的河”的提问下，一些网友还踊跃提供了自己所熟悉的河流的名字，基本上都是分布在平原省份的小河。

由此可见，我国自东向西流的河，有，但是不多；不多，但是有。正如此，他们因与众不同而显示出了独特价值，对自然，对生态，乃至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人和人类。

这些年，每到夏季有机会回故乡，我都会到乌裕尔河的河边，久久地伫立，痴痴地凝望，那晚霞映照中的河水，平静地向西流，仿佛就要流进霞光之海中。这时候的逆流之河，往往在带给我一种沉醉之美的同时，奇怪的是，竟还会让我产生一种力量之美，这种感觉，是我自小在她身边从没有感觉到的。

不错，逆向的确是会产生力量的，这完全符合物理原理，也被社会现实所证实。逆流之河是，逆行之人更是。在中国人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，那转身而去的背影，即使年迈，即使弱小，但那份平静，那份坚定，可以让你的内心产生足够战胜恐惧的力量。正是这些逆行者，为我们筑起了阻挡疫情蔓延的铜墙铁壁。

夕阳下逆流的河，灾难中逆行的人，最近经常在我眼前交替出现……



东方兵学圣典《孙子兵法》开篇即言：“兵者，国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。”中国自古就特别重视战事，强调应慎重对待战争，因为古人认为天地间万事万物皆有其运行法则，尊重并按照这种法则行事，就可以获得吉祥，否则，就会招致凶灾，而通过对自然万事万物发展变化规律的观察，他们发现天道好生恶杀，万物乐生恶死，而兵戈是杀生之器，战争是杀生之事，它们能够给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灵带来伤害，所以诸子各家几乎一致认为它们是凶险的事物，对其抱持谨慎的态度。如孔子说“子之所慎：齐、战、疾”；老子说“兵者，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”；尉缭子说“兵者，凶器也；战者，逆德也；争者，事之末也”；《政要论》里说“战者危事，兵者凶器，不欲人之好用之”等等。

然而，古人对战争抱持谨慎态度，却没有彻底反对战争，同样是基于对天道自然规律的认识与遵从。所谓天道，如春生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，万物春夏生长到最繁盛的状态，秋冬便以肃杀之气来收敛。《周易·系辞上》讲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，《道德经》言“万物负阴而抱阳，冲气以为和”，这就是说阴阳调和，万物才能生长。古代圣人通过对天地规律、人情事理的理解和把握，效法天地生养万物，重视施行仁政；又效法天地威杀万物，轻贱施行刑罚。因此，战争，作为大刑手段，为圣人所轻贱，但却不会废弃，因为肆意发动有违天道，完全废止同样有违天道，《汉书·刑法志》中就讲到，“天生五材，民并而用之，废一不可，谁能去兵？鞭扑不可弛于家，刑罚不可废于国，征伐不可偃于天下。用之有本末，行之有逆顺耳”。

中国古人慎战的观念除了源自对天道自然规律的深刻体认，还出自对战争危害性的深切感受。战火之下，生灵涂炭，万物萧条，社会动荡不安，百姓流离失所。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和感受，所以古人始终强调慎战。因此，在古代战争中，大多时期都视武力征服为最下等的计策，而视不战而屈人之兵为最高明的计策。如孙子说“百战百胜，非善之善者也；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”；姜太公亦说“善战者，不待张军；善除患者，理其未生；善胜敌者，胜于无形；上战无与战矣”。

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追求体现了中华民族“以和为贵”的传统美德。那怎样才能实现呢？最好的方式就是施行礼制、推行仁政。《司马法》中讲“以礼为固，以仁为胜”，以礼为规范，国家就会稳固；以仁为

原则，国家就会制胜。这也是古代贤明君主的治国之道，孔子向弟子曾参讲述明王之道时就如此说，“明王之道，其守也，则必折冲千里之外；其征也，则必还师衽席之上”。为什么礼制和仁政能达到这样的效果？在《论语·学而》篇中，有子言“礼之用，和为贵，先王之道，斯为美”。意思是说以前圣明的君王治理国家特别重视礼，就是因为认识到它能使天下和谐。关于礼的作用，《左传》里有这样一段话，“礼，经国家，定社稷，序民人，利后嗣者也”，“君令而不违，臣共而不贰；父慈而教，子孝而箴；兄爱而友，弟敬而顺；夫和而义，妻柔而正；姑慈而从，妇听而婉；礼之善物也”。不难看出，礼能使社会各个阶层各司其职、各尽其责、各守其分，使百姓人人和睦相处、相亲相爱。

然而，圣王治国并不是只依靠礼，更重要的是依靠仁。孔子讲“人而不仁，如礼何？”一个人如果没有仁爱之心，又怎么会遵守礼制呢？所以心存仁爱是遵守礼制的前提和根本。心存仁爱，便可以化干戈为玉帛。孟子讲“仁者无敌”，并不是说仁者好战，打遍天下无敌手，而是说内心充满仁德的人（国家），他（它）对待一切人（国家）都是平等的、友善的，不亲疏远近强弱大小，他（它）的心中没有对立、眼里没有敌人，这样的人（国家）走到哪里都是受到欢迎的。即使有些人（国家）对其抱有敌意，他（它）也会以仁爱之心去包容、去化解，从而感化对方。可见，施行礼制、推行仁政能使国家形成一种强大的力量，对内可守，对外可攻。

当然，古人推崇不战、慎战，并不意味着偃战、废战。战争，虽主杀伐，为天道、人道所共恶，却也是顺应天道、人道使然，只是非万不得已不能使用。既然是不得已而用，那么什么时候可以使用？不战而屈人之兵固然是最高明的用兵境界，但如果短兵相接不可避免，那又该如何保证以最小的代价获得胜利？对此，在《荀子·议兵》篇中，荀子很好地回答了这两个问题。他认为，用兵的应是为了禁暴除害，而不是争夺名利。所以仁义之师，所过之境，敌人稽首，百姓欢喜，能够兵不血刃，迳迹来服。《司马法》中也讲到“古者以仁为本，以义治之，治之谓正……是故杀人安人，杀之可也；攻其国，爱其民，攻之可也；以战去战，虽战可也”。简而言之，只有出于仁爱

□ 张超

以和为贵 好战必亡

患才能用兵，这也是唯一且正当的理由。

那如何以最小的代价获得胜利呢？荀子讲“凡用兵战攻之本，在乎一民也”，“善附民者，是乃善用兵者也”，这就强调用兵的根本在于人事的协和、在于能够得到人民的支持。这与孟子所说“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”表达了相同的观点。人心所向是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，这是亘古不变的规律。

当然，战争毕竟是凶险的事情，若恃强任威、穷兵黩武，则必将自尝苦果。古今中外，无一例外。《司马法》中说“国虽大，好战必亡”，《典语》中也说“兵犹火也，不戢将自焚”。因此，战争，国之大事，当谨慎之。所谓“好战者亡，忘战者危，不好不忘，天下之王”，这是千百年来中国古人验证的真实道理。



后来晋文公的

□ 高玉敏



作为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重耳，是历史上一位比较有特点的政治人物，他的特别之处一方面在于他的经历比较坎坷。春秋时期，王室衰微，诸侯力政，群雄并起，霸主纷出。重耳青壮年时期遭遇晋国骊姬之乱，42岁开始流亡国外，经历了整整19年颠沛流离之苦。另一方面在于他的杰出的政治智慧。虽然回归后的晋

文公执政仅仅9年，但是他内革国政，外结诸侯，很快成为继齐桓公之后而起的霸主，恢复了晋国中原大国的卓然地位。古人往往“齐桓”“晋文”并称，晋文公为人从政都有很多非凡之处。

知人善用，务尽其力。晋文公结束颠沛流离的生活、登上君主的舞台，一直达到霸主巅峰，并不是个人的幸运，很关键的一点是信任贤能、知人善用。他能够重视各方面人才的价值，注意利用各种机会与贤士交往。在国内招揽人才、重用人才，在国外倾心结交人才，为晋国谋利益。晋文公还是公子的时候就“谦而好学，善交贤能智士”，身边聚集了一大批有识之士。当他逃奔狄国时，随行的有狐偃、赵衰、颠颉、司空季子、魏武子等人。这些人或是政治家，或是教育家，或是勇力出众的将战，其中赵衰、魏武子以及赵衰收养的韩厥，他们的后代开创了战国赵、魏、韩三大强国的恢宏基业。晋文公手下的先轸更是曾被誉为中国军事史上战神第一位。这样一群能人贤士成为重耳建立功业的雄厚人才基础。晋文公的谦和在下也为了他在晋国建立了很好的名声和人脉。在他出逃期间，惠公、怀公两朝国家动荡，人心思安，晋国朝野上下对流亡在外的晋文公有着极大的心里期许，这就为晋文公的顺利登位打下了良好的民众基础。

言信行果，谨守然诺。所谓“民无信不立”，作为一位杰出的君主，晋文公在统治中重视诚信，而且努力做到谨守承诺，不失信于人。他流落楚国的时候，楚王要求他讲明将回国掌权后会如何回报楚国，晋文公虽然处在流亡的环境下，但对楚王的要挟表现得毫不卑亢。他说道：“若以君之灵，得反晋国。晋楚治兵，遇于中原，其辟君三舍。若不获命，其左执鞭、弭，右属囊、鞬，以与君周旋。”这句话表达了两层含义，一是说：为了报答楚王的款待，将来在中原战场

相遇，我会退避三舍；二是说：如果您不退兵执意进攻，为了表示对您的尊重，我一定全副武装，认真地与您作战。后来晋楚城濮大战，晋文公在战役开始之前确实做到了退兵90里，表现出了信守承诺的胸怀。晋文公攻原之事也体现了这一点，他带领军队攻打原国时，命令士兵带足十天的干粮，结果十天没有攻下，晋文公决定收兵。士兵报告说原国再有三天即可攻下，大臣们说再坚持一下原国就支持不住了，但晋文公仍然照原定计划撤兵，他说：“信，国之宝也，民之所庇也。得原失信，何以庇之？所亡滋多。”在他心目中遵守诺言远比攻下城池重要得多。当晋军后退30里的时候，原国守将感于晋文公的守信不失而主动归降，由此可以看出晋文公守诺重信的魅力。

改革弊政，自强为基。晋文公接手后的晋国百废待兴，周围强国虎视眈眈，晋国必须迅速强大起来才可以应付疲弱的局面，所以晋文公着手进行各方面的改革。政治上，充分发掘人才，不仅重用当年的追随者，还包括惠公、怀公时期的旧族，明贤良，尊贵宠，赏功劳，晋国上下各司其职、团结一心。经济上，薄赋敛，赈困穷，轻关易道，通商宽农，鼓励农桑，省用足财，晋国政平民阜，财用不匮。法律上，明刑定法，执法严格。《左传》说：“文公其能刑矣，三罪而民服。”军事上，在原来二军的基础上设三军，后来又增至五军，设六卿，诸军将佐选拔主要在狐氏、先氏、郤氏、胥氏、栾氏等十一家中选出，赋职任功，分管军权，晋国军事力量空前壮大。这些措施使得晋国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实力大增。

审时度势，善用外交。针对当时复杂的天下大势，晋文公制定了相应的国家政策。此时的周天子仍然具有一定的实力，是天下共主。鉴于“名不正，则言不顺；言不顺，则事不成”的情理，晋文公审时度势，坚持推行“宗周”的方针。周襄王的弟弟

王子带联合狄人攻周，大败周军，周襄王逃居郑国。晋文公敏锐地抓住了时机，赶在秦穆公之前把周襄王接到晋国，击杀王子带，得到周天子的认可，并赐河内、阳樊两地给晋国。晋国在战略上占据了主动。

在与其他诸侯的关系上，晋国、齐国、秦国同为邻邦大国，彼此多有恩怨，晋文公流亡时在齐国、秦国都得到了很好的接待，但国家之间毕竟还有利益冲突，齐晋肇之战、秦晋殽之战都是春秋时期比较著名的战役。晋文公机智地处理利害关系，努力实行联合齐秦拒楚的外交政策。最终，晋国攻曹、卫，败楚、服郑，强国之势，锋芒之盛，一时无二。

城濮之战，晋文公大败楚军，极大地增强了晋国的实力。公元前632年，晋文公大会诸侯于践土，参加会盟的有晋、鲁、齐、宋、蔡、郑等国，晋被推为盟主。周天子也派出代表参加。周襄王给晋文公的命辞说：“敬服王命，以绥四国，纠逖王慝。”赋予了晋文公可以代表天子征伐诸侯的权力。践土之盟的成功正式确立了晋文公的霸主地位。

史学家顾颉刚在《国史讲话》中说：“晋文公的主要功绩是城濮之役遏住了楚国，使他们不得向北发展。晋襄公的主要功绩是崤之役遏住了秦国，使他们不得向东发展。有了他们父子，春秋时的中原诸侯才获得休养生息的机会，才渐渐孕育了后来诸子百家的灿烂文化。”客观地说，晋文公凭借高超的政治智慧不仅为晋国赢得了百年霸业，也为中原数千年文化的繁荣发展创造了条件。



中央党校校园风光 张晓光 / 摄

